

从加尔文宗教改革看西方现代性起源

□张晓毓

(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本文从加尔文宗教改革客观影响的角度认识西方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加尔文清教从宣扬宗教利益出发, 重塑信徒的职业观, 从社会伦理和公众心理上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倡导自然科学并大力扶持文化教育; 采取民主共和的教会与行政管理策略, 客观上对西方现代性的萌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现代性; 加尔文; 宗教改革;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0) 07-0124-03

一般认为, 现代性标志着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 资本主义的世俗化社会开始建构, 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流动, 建立民族国家、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 在思想文化方面, 建立以启蒙主义理性为原则的对社会历史和人的反思性认知体系, 以及进行大规模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教育体系。而对于现代性起源的时间问题, 学术界则因各学科对资本主义缘起的界定不同而有分歧, 如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把现代性定义为“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 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 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 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18世纪启蒙运动视为现代性缘起的标志。如果我们将欧洲现代性问题放在一个更广阔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变迁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或者可以从宗教改革客观影响的角度来认识现代性起源问题。

本文从16世纪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清教主义神学主张及其教改实践的角度探讨其对西方现代性的影响, 作为“近代世界的先驱”,^[2] “他把宗教改革的进程同西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 又把与现代立宪政治相适应的民主主义原则、决定经济发展的原则化为自己工作的原则”。^[3] 相比起其他大部分神学家, 加尔文对上帝的有着更为全然的敬畏, 他的教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赞扬“无限智慧、正义、至善、仁慈、真理、美德与生命的上帝”。^[4] 人类因为永久性原罪的束缚而“全然败坏”, 人类有限的知识与理性决定了人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达到自我救赎, 基督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介人, 可能因恩典赦免人的罪过。信徒的天职就是完全依靠上帝, 以神的律法来衡量一切行为, 以荣耀上帝并彰显其全能主权。对上帝的绝对权威的强调不仅引发了加尔文自己的一系列宗教观点, 对他的宗教改革措施以及世俗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 宗教是以追求精神层面神圣目标的方式, 通过宗教伦理实现社会的整合、秩序的建构以及对人的规

约, 加尔文清教以其教义重塑了信徒的职业观, 为当时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伦理和公众心理上形成铺垫, 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现代性的孳生。

首先, 加尔文神学改变了信徒对劳动和分工的认知, 所有的工作都以服从神意为宗旨而无分圣俗, 为资产阶级从事商业贸易或做工匠找到了体面的解释。从上述对上帝的谦卑克己的根本基点出发, 加尔文认为每个人的生活范围、职务工作都是至高无上的主所交付和安排的, 这样工作本身就被圣化了。所有的职业都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 都是荣耀上帝的手段, 在神面前地位一律平等, 任何剥夺天职的行为都违反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 必须努力消除贫穷问题, 教会和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人民的工作权, 加尔文建立的教会成功地促使议会达成多项措施如提高就业机会、制定合理工资等。

其次, 预定论推动了信徒形成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和以克尽天职为目标的财富观。从上帝无上权能的中心观念出发, 加尔文提出了他的“双重预定论”。上帝以其预定且绝对的旨意决定人只能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救赎, 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预定了一些人被选上而获得永生与拯救, 被选让我们崇敬和赞美神的恩典; 而另一些人注定被摒弃而永远罚入地域, 其灭亡和失败则以上帝公正的判决, 显示了他的荣耀。加尔文对“选民”的外在标志进行了重新界定, 如果基督徒在某种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中卓有成效并道德高尚, 参加和服从教会, 他就具备了蒙呼召成为选民的外在标志。否则便是弃民。由于人的理性与智慧永远无法企及无所不能的上帝, 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拣选, 这在典型的加尔文主义者心中引起了渴望得救的恐惧和焦虑, 因此他们不断地通过世俗的成绩或善功来寻找自己被认可为“选民”的证据, 主观上证明蒙选的努力在客观上造就了一种拼命工作、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社会效益。加尔文也因此极力提倡诚实、正直、勤勉的职业道德, 反对欺诈和投机, “人之发财致富, 不是凭美德、智慧、勤

[收稿日期] 2009-12-20

[作者简介] 张晓毓 (1975-), 女, 湖北丹江口人,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博士后, 讲师, 研究方向: 西方文论、比较文化。

理论界 2010 第 7 期

124

劳，而仅仅是凭着上帝的祝福”。^[5] 加尔文的这套预定论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和穷人的受苦受难都是上帝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既否定了封建贵族的特权，又承认资产阶级剥削的合理性。规范职业道德和鼓励个人正当追求财富，也从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不义竞争进行规范。

第三，生活的圣洁化和彻底的基督教化也是加尔文神学的一大要求。他认为，拼命工作创造财富，目的是给上帝带来荣耀而不是俗世的享乐，痴迷物质享受有悖于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他反对铺张浪费和无节制的娱乐，严禁赌博、跳舞、打牌、酗酒、卖淫等行为，禁止游戏、宴乐、装饰，包括宗教艺术。他为日内瓦人们的日常生活制定了严苛的禁欲主义规范，如有违反就会遭到鞭打、监禁、流放，甚至是死刑。这确实带来了社会风气沉闷压抑、人们沉默胆怯等消极后果，加尔文本人也因此历来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也应看到他对节俭、朴素生活作风的鼓励从客观上净化了社会风气，严明的节操和勤勉的生活有助于资本财富的积累和增加。正如弗罗姆所说：“强迫自己去工作，喜爱节俭，把个人的生活变成达到别人的权力之目的之工具，苦行禁欲，以及一种强制的责任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性力量，没有这些属性，现代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6]

加尔文神学通过宗教观念与伦理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物质积累，肯定了资产阶级盈利活动及追逐正当财富的合法性，为将工人驯化为认真勤勉的劳动者提供了教义上的支撑，使西方社会走出了视盈利冲动为罪恶的中世纪传统宗教伦理的禁锢，禁欲主义节俭的倡导也有利地推动了资本积累。马克思·韦伯说，作为加尔文改革的一种后果，新教伦理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在17世纪的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地，加尔文教派的信仰与都市的中产阶级商业结合起来，缔造了经济成功的传奇，后来加尔文宗教传入北美，也对当地的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恩格斯曾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7]

二

现代性的萌生和社会的启蒙是与科学发展和教育普及息息相关的，发达的科学技术、高素质人才的储备以及人们文化思想境界的提高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强大后盾，表面上看似与这些方面无关甚至对立的加尔文神学及其教改活动，站在对上帝的敬畏的出发点上，肯定科学研究并重视普及教育。

我们知道，基督教认为自然不是令人畏惧和让人顶礼膜拜的神，而是让人类珍惜、研究和管理的一件上帝的作品，因此，并不反对人们对自然界进行研究（这一观点参见霍依卡的《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等著作），加尔文因反对日心说和下令烧死科学家塞尔维特而一般被视为一个反科学的斗士，但深入研究表明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偏颇。“他是一个非常讲求实际和极有造诣的人

文主义者，因而不相信原罪会导致人类在科学领域里的全面堕落”，^[8] 虽然他认为人性全然败坏，但他没有因此彻底否定知性，探求真理的欲望是人类在堕落后仍然继续发光的火花之一，知性也能被人用来创造卓越的艺术、科学和哲学。

出于对上帝权能的膜拜，加尔文倡导基督徒应该热心科学文化。上帝的具体形象无法用语言描述，但上帝并非不可知，因为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和法则的，人类可以通过对创造物的认识来间接理解上帝对人类的眷顾和爱，“宇宙精巧的秩序性便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认识上帝智慧和秘密的手段，可以体现对上帝的伟大与荣耀的认识，因此，探索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就成为基督徒的一种必要的天职。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研究每次获得的进步都是上帝新的启示，意味着对上帝的认识更进一步，也会增强信徒对上帝的信心。与此相应，加尔文攻击那些占星学之类的伪科学，因为它们损害了上帝的无上权威。这种通过研究自然来理解认识上帝的天职观逐渐演变成信徒的内在驱动力和重要的宗教义务。

加尔文的教育观也建立在推崇上帝权威的思想基础之上，他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和普及教育的工作。首先，基于“全然的败坏”的观点，他不认为知识能改进堕落和罪恶的人心，知识必须和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属灵的教导和救赎相联。其次，他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宗教的，教师和牧师是上帝的使者，培养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教育可以说是传播基督教的工具。再次，教育有利于培养信徒的品格、提高信徒的素质，信徒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将有助于他们直接阅读圣经和接受宗教训诫，增强对上帝荣耀的理解。信徒文化素质的提高将会促进社会整体道德的进步与国家意志及法律的实行。基于此，加尔文认为政府应当重视普及教育，并明确提出了对全体公民进行义务教育的主张，日内瓦所有的儿童都实行免费教育。儿童进入预备学校，低年级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高年级要熟读各派名家如奥维德、荷马、德摩西尼的著作。尤其体现出加尔文教育理想的是1559年成立的日内瓦书院，品格的培养是书院的主要目标，神学与圣经是重要的课程，教师的施教必须突出“爱上帝及恨罪恶”的宗旨，此外还包括符合文艺复兴概念的高等教育如神学、哲学、伦理学、数学、物理、辩论学及历史等课程。加尔文在教育方面的贡献确实极有价值，日内瓦的办学模式先后被介绍到荷兰、苏格兰、北美等地，现代美国学者班克罗夫特称他为普及教育之父，免费学校的创始人。

由于“教育在人文科学中被提高到一个适当的地位，学校、大学和福利机构办得无与伦比，科学也得到了精心的栽培，随着学院的创建，加尔文带来了第一个新教文化中心”。^[9] 从宣扬宗教的角度出发，加尔文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并大力扶持文化教育，客观上刺激了西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

高效完备的社会组织机制、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观念与公正的法的意识是现代性的一大重要标志，这种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性的现象并不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

物，早在加尔文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浮现出来了，主要体现在他的教会和行政管理策略上。

加尔文的教会观和政治观决定了他在教会改革上采取民主的精神和态度。一方面在教会和政府的关系上，他认为将属灵的生活和属世的生活完全分开，是对社会的极度不负责任，世俗国家应该为基督的国度服役。教会作为基督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进行着“殊死”的战争，因此必须扩展基督的权力，使其成为全社会的元首，世界各国的掌权者要为基督统治的神圣使命而努力。另一方面在基督徒个体的政治素质上，他强调教徒应该关心政治、参与改造社会，注重发展和训练平信徒的政治素养和意识，鼓励有能力的教徒在政府中任职，而那些没有职务的普通教民也有责任积极监督教会和政府。这些思想对加尔文教会改革的具体实施以及当时的资产阶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上述观念出发，加尔文相信通过选举和议会可以把民众的意愿和贵族的意愿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贵族化的、教会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的精英政府。他继承路德的“平信徒皆为祭司”的理论，废除了以前的旧职，将教会组织彻底改革为共和制的组织，平信徒参与教会行政是其重要特征，从中民主选举牧师、教师、执事和长老四种教职人员。长老是由议会任命的教会世俗领袖，作为平信徒中比较成熟、热诚和有才干的人，代表了平信徒的虔诚精神，集中体现了平信徒对教会的贡献。执事由具有良好的行政才能并能为贫民奔走的人担任，负责消除贫穷现象、医疗慈善救济等公众服务工作，重要的政策可由执事会议自行决定。由执事和若干长老组成的长老会负责处理教会事务，监督教徒的言行并制定执行教会律法。作为教会中最有权力的部门，宗教法庭以投票的方式决定重要事件并颁布戒律，还可以决定是否把教徒开除出教。执政者们尽管深受教众的尊敬，但因其职责是弘扬上帝之道，仍要接受一般教徒的监督和批评。加尔文把全部社会生活置于基督教教义的荣誉之下，力图建立一个神圣而又公正的教会，“他在宗教的组织形式上给了人政治自由”，“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10]

加尔文的“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宗教组织形式，和讲求实际、鼓励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的教会观符合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及其在政治上企盼更多权利和自由的愿望。“在后期的西洋史上，例如在荷兰、苏格兰、英国、和美国史上，加尔文著作中的这些雏型观念对于建立以后的民主政

府占有相当重要地位，较之当时加尔文所预期的更大。”^[11]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加尔文宗教改革对后来资产阶级追求民主共和的影响，“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12]

正如弗里德里希·希尔所说，加尔文主义者“在16世纪推动了西欧宗教改革的发展；17世纪里推动了国际政治的发展；18世纪又推动了西欧科学的发展。16世纪之后，欧洲无论在劳动精神、在雄心壮志、殖民开拓、战争与经济的结合、自然科学的进展，都与加尔文主义者的活动分不开。通过上述过程，欧洲第一次成为西方”。^[13]加尔文主义在客观上适应了当时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在经济、科学、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部分要求，虽然这些影响还远不能说直接形成了当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社会组织结构、有效的经济秩序和思想文化体系，但无疑对欧洲现代性的萌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
- [2] [13] 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三复译.欧洲思想史 [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407.
- [3] Olivier Christin著，花秀林译.宗教改革——路德、加尔文和新教徒 [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149.
- [4] 迈克尔·马莱特著，林学仪译.加尔文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3.
- [5] [10] 梅列日科夫斯基著，杨德友译.宗教精神 [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11、259.
- [6] 弗罗姆著，陈学明译.逃避自由 [M].上海：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61.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1.
- [8] 霍依卡著，钱福庭等译.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146.
- [9] [11] 茨威格著，赵台安，赵振尧译.异端的权利 [M].北京：三联书店，1986：235、240.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

责任编辑：许建